

主導性霸權的困境

九一一後國際局勢與美中台關係演變

吳釗燮*

- 一、國際關係理論發展與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
- 二、國際體系變動下的國際權力重分配：中國崛起
- 三、當前國際體系下影響力重整脈絡分析
- 四、從軍售議題看美對台政策的微妙變化
- 五、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蘇兩強各自主宰其集團的情勢，因前蘇聯的瓦解與冷戰結束而告終結，代之而起的是美國為主導性霸權（dominant power）的局面。在美國為全球獨霸的狀況下，國際活動與國際政治運作，也由美國所領導的西方世界所主導。但整體的國際環境，在 2001 年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一方面，美國投入了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又需要面對北韓、伊朗等國際問題的挑戰；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軍事、外交方面的實力也大幅增進，雖然中國尚難成為一個可以取代前蘇聯的超強，但是美國的地位與影響力卻已經無法與九一一之前相比。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國際局勢變化的過程，正足以提供學界驗證相關理論的機會。本文擬從體系理論與現實主義理論的觀點探討九一一事件之後國際局勢的變化，尤其針對中國國力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E-mail: jaushiehwu@gmail.com

投稿日期：2009 年 09 月 29 日；接受刊登日期：2009 年 12 月 11 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0/第二十八卷第一期/頁 1-32。

崛起的因素與美國影響力變化的相關性加以檢視，並以美國對台的軍售政策為例，來探討當前的國際環境。

關鍵詞：九一一事件、主導性霸權、中國崛起、區域性強權、國際體系、現實主義、權力、影響力、美中關係、美台關係

一、國際關係理論發展與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

國際政治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而國際政治學者的研究目標之一，是希望能夠在這些多重不確定因素之中找出條理，找出重要的「概念」，並以這些概念來形成理論，找出假設，測試假設，或找出不同複雜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但因為不確定因素太多，而讓一些國際政治的學者感受到「理論的蒼白」(theoretical pale)，而必須在理論的一片蒼白之中努力尋求因果關係的確認 (Rothstein, 1991: 21-37)。但即便國際政治研究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國際政治學者也努力在不同層次的分析單位中，努力去找尋一些可以解釋各種現象的原則 (Morgenthau and Thompson, 1985)。

在國際關係研究的不同理論之中，以整體國際體系作為研究重點，這理論基本上認為國際體系的變化，會帶動國際規則的變化，也會影響到這體系之中各成員的行為變化，而從這一理論可以引申出許多可資驗證的假設。以國際體系的理論探討國際關係，其分析的層次為體系本身，由體系的結構與分配來看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模式，有如以國際體系作為最主要的獨立變項，而以行為者之間的互動作為依賴變項。

以體系理論的邏輯思考而言，就如同 Kenneth Waltz 所強調的，結構 (structure) 是因為其下各部份 (parts) 的安排 (arrangement)，只有各部份安排的變化才能視為結構的變化 (Waltz, 1979: 80)。但國際體系因為在較長時間內並不發生快速的重新安排，導致分析的個案數 N (亦即不同的國際體系) 非常少，這在邏輯上會發生解釋力的困難。因此，國際關係學者也試圖將分析層次降低或縮減，這

一縮減學派 (reductionist) 就主張應將分析層次降低至國家作為分析的單位 (Waltz, 1979: 38-78) , 這更能顯現個別國家的不同情況 , 也讓國際關係研究更具真實性。

現實主義便以國家層次為研究的主體 , 此一理論主要在探討國家權力的形成與變化 , 並以權力的變化與平衡來解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此一理論的主要假設是國家追求的目標是國家權力的強化與影響力的提升 , 而由此假設也可以推演出一個國家在何種情況下會採取何種行為 , 以強化國家的權力與影響力。當然國家權力的強化過程中難免會引起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排擠與競爭 , 而權力的平衡 (balance of power) 的概念 , 就是這理論認為維繫國際和平的方法 (Morgenthau and Thompson, 1985) 。

相對於現實主義 , 研究國際政治經濟的學者認為 , 在自由貿易與市場經濟的帶動之下 , 國家與國家之間已經進入了相互依賴的局面 , 而為了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為有規範可循 , 於是成立各種國際組織 , 且必須依照國際組織的規則作為國家行為與互動的準則。這國際經貿互賴的理論衍生了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 理論 , 此一理論甚至隱含「道德」的色彩 , 思考如何以國際的建制來栓住無政府式的權力追逐 (Vasquez, 1983; Krasner, 1983) 而現實主義理論的研究者也承認其理論體系對於解釋國際關係的能力仍有不足 , 無法擔靠權力與利益的角度就能充分詮釋國際政治 , 而有賴於國際組織與國際機構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等研究作為輔助 (Keohane, 1984: 14) 。

80 年代之後 , 以體系層次或國家層次作為分析單位的研究 , 受到許多國際政治學者的批判、修正與補充 , 有些學者認為政府的決策受到官僚體系慣性的影響 , 因此有人專門研究官僚體系的行為 ,

引申出以官僚為中心的決策模式 (Allison, 1971)。有些學者認為，國際體系與國家並不是行為的單位，決策者才是行為的單位，是決策者在決定政策，因此個人層次的思考與判斷才應該是研究的重點。而為了針對決策者進行研究，於是發展出來與政治心理學相關的學門，包括認知圖像、動機、認知與錯誤認知、防衛機制等與個人心理相關的研究，以這些研究來理解決策者為何作出他們所作的決策 (Jervis, 1976; Jervis et al., 1985)。這些林林總總的國際關係理論與研究，都豐富了國際政治學的內涵，也讓學者可以自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瞭解當代的國際關係。

若觀察整體國際局勢的改變，八〇年代末期冷戰結束之後，是國際局勢變動的劇烈時期。在冷戰的年代，東西成了兩大集團，各由美國與前蘇聯主宰，雙方各自發展其國力與勢力範圍，各自設立其成員國的行為準則與相關規範，並企圖發展強權本身與內部成員的權力，並設法弱化另一集團的權力，包括支持與發動代理人戰爭等。兩集團雖競逐權力，然因為雙方也具有相互毀滅的武力之恐怖平衡，而終能維繫整體的和平，未爆發大型戰爭。

在冷戰結束之後，蘇聯本身瓦解為多個共和國，原東歐共產集團也陸續轉變為多個民主國家，整個國際體系也由於美國是唯一的超強，其軍事能力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望其項背，其經濟規模也是全球最大，在高技的研發與創新方面的能力也最強大，在國際事務也有無可取代的領導能力，美國與其主要歐洲的盟友也主導國際局勢與各國的行為準則與規範，共同介入國際議題。在此一情形下，美國就是一主導性霸權 (dominant power)。在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美國於次年領導多國軍隊將伊拉逐出科威特，充分展現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主導地位。在美國之外，雖然有一些

中大型國家，分別在經濟或軍事方面具有相當規模的能力，但這些國家的總體能力，是無與美國相比的。冷戰後的國際體系，與原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呈現相當明顯的對照，也提供國際政治學者許多不同的啟發與機會，重新檢視原有理論所提供的假設與設定的因果關係。

然而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國際局勢又面臨一波相當微妙的變化，一方面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分別用兵，但戰事卻久拖不決，削弱了美國的整體國力。在另一方面，中國在前蘇聯瓦解之後，由於經濟改革開放的成功與軍力的強化，使得其綜合國力與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不斷上升。尤其是在美國受到兩場戰爭與幾個重大國際問題的拖累，其獨霸的地位與國際影響力漸漸受到侵蝕的時刻，中國的影響力相對的快速上升。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已難以在國際間單獨執行其所設定的行為準則與規範，而必須仰賴他國的支持，尤其是中國的配合。這現象，也提供學界對於國際體系一個很好的研究機會。

雖然國際關係各種理論都有其侷限性，單一的理論體系都難以完全解釋所有的現象，但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國際局勢產生快速變動的情形下，以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的分析層次與角度出發，已可以提供許多讓我們更深入瞭解國家權力與行為變化的規則。在這一方面，Robert O. Keohane 早在 1984 年所著的 *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就其論述對於主導性霸權之權力升降有先見之明，也提供學術界可供借鏡的觀察與分析。本文擬自現實主義的觀點，以國家層次為分析單位，試圖理解在目前的國際體系之下影響主要國家互動的一些因素，以探討在目前有一主導性霸權並有一崛起中強權的國際體系之下，國與國之間影響力升降

的情況，並以美國處理對台軍售為例，檢視美國對台灣政策的變化。當然，現實主義有其本身的侷限，尤其是以國家為分析層次，必須假設其他條件是相等的（all else being equal），若要進一步探討官僚體系、政策決定、領導人特質或涉及決策者個人的觀點或決策風格，還有賴其他理論體系來作進一步的研究。

二、國際體系變動下的國際權力重分配： 中國崛起

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政經崛起已有許多研究。雖然在各項研究之中，對於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甚或其社會是否成熟穩定有些質疑，如來自中國的學者裴敏欣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就有很深入的刻劃（Pei, 2006）；美國柯林頓總統時代的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hirk, 2007）也在其著作之中稱中國為脆弱的強權（Fragile Superpower）；也有歐洲學者如 Guy Sorman（2008）對中國持極端負面看法的實地觀察。但同時，學界也有許多試圖瞭解中國崛起的現象，並分析其可能帶來的影響的學者，如 Ross Terrill（2003）、David Shambaugh（2005）、Robert Sutter（2005）等。然而無論各界對於中國政權的本質或其經濟發展是否能夠持續有所討論，認為中國崛起已是學術界與國際政治的主流意見。

在中國開始全力發展經濟之後，由於擁有充沛且廉價的勞力，吸引了世界各國製造業競相到中國設廠投資，使得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三大的經濟體。雖然各界對中國經濟仍有部份保留和懷疑，如中國尚有一些極需改革的體制與日益擴大的地域和收入差距，也有認為可能會在未來造成中國社會的動盪不安，但已有一些經濟機構

預言，中國在廿一世紀中葉之後，有機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伴隨中國快速經濟發展而來的，是其龐大的外匯存底，眾多人口所形成的購買力，以及以政治掛帥的靈活行銷策略，使各國對於和中國做生意或取得中國訂單為崇高的思考。也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使其擁有強大的外援能力並且可以投資於軍事現代化，而這些都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之中發揮強大的影響力。在美國受到兩場戰爭與幾個重大國際問題的羈絆時，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相對的提升許多，也被許多國家用來作為平衡美國影響力的槓桿。在當前一些讓美國或其民主盟國感到困難的國際爭議點，如北韓、伊朗、緬甸、蘇丹、辛巴威等，都可以發現中國的角色無法忽略，也可以發現中國藉著與爭議當事國的特殊的關係，成為美國或多邊國際組織期待負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情況。

中國挾其經濟實力，透過外援、投資、軍事援助與購買原物料的方式，發展與較落後國家的關係，在許多國家與地區已經建立了相當高度的政治外交影響力。以非洲地區為例，美國與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動輒對落後國家附加改善人權等作為援助的條件，而中國則以不介入內政為由，無視於人權的狀況，因此中國的海外援助比民主國家的援助更受到非洲威權執政者的歡迎，中國已經成為許多非洲國家領袖「朝拜」的地點。許多非洲國家領袖也透過與中國改善關係，吸引中國投資，以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人權改善或政府治理的要求。在 2006 年於北京所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高峰會，就聚集了四十個非洲國家領袖，看來中國在整個非洲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已經沒有其他國家可及。雖然小布希政府第二任時對此已有所警覺，並且希望透過成立非洲指揮部 (Africa Command) 的方式穩住其影響力，但已陷入兩場戰爭的美國，已無餘力在非洲進行較具

規模的部署，因此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仍然無法拉升。

中國被聯合國要求介入蘇丹達佛 (Darfur) 地區，就是中國實力坐大，並獲得影響力與實際利益的很好例子 (Pham, 2006; Pham, 2008)。蘇丹政府放任民兵對達佛地區土著的屠殺，引起國際社會普遍嚴重關切，聯合國認為中國是唯一能對蘇丹政府發揮影響力的國家，因此要求中國介入蘇丹的內部爭議，協助阻止屠殺的罪行。而中國能對蘇丹發揮影響力的原因，乃因中國為蘇丹的最大石油出口國與最大武器供應國。而中國協助聯合國的方式，是派遣為數三百的維和部隊，雖然這維和部隊僅為無武裝的工兵部隊，所能發揮的實際作用不大，但中國卻在非洲有了軍事的落腳點，對其擴展在非洲的影響力自是更上層樓。

中國在軍事方面的成長也相當快速。從中國決策者與高層軍事將領的發言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本身軍事實力的期待相當高。中國為了快速改善其軍事能力，積極向俄羅斯洽購現代化武器，包括 SU-27 與 SU-30 先進戰機、基洛級潛艦、現代級驅逐艦等先進武器系統。此外，中國也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的聯合演習，以改進其實戰的能力。中國除了在太空戰、資訊戰、阻絕美國航空母艦介入台海衝突的能力受到國際注視之外，近年來，其軍方顯然已經拋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策略，公開談論航空母艦的取得，也開始組訓海上航空部隊，積極取得 SU-33 型或 J-11 等艦載戰機。而由於航空母艦具有高度的海權象徵 (陳世昌，2008)，當然引起美、日、韓、紐、澳之高度關注 (鄭曉蘭等，2009)。中國潛艦常出沒於日本領海，其軍艦在南中國海敢於跟美國探測船對峙，更顯現中國海軍自信心已經大幅提高 (鄭寺音，2009；張宗智等，2009)。

在亞丁灣的海盜問題顯得極為嚴重時刻，中國也宣布派遣兩艘

先進驅逐艦至亞丁灣區域巡航，凸顯了軍事強國的形像，並藉機獲得更多海上遠距演訓的經驗。而一些美國軍事學者針對這些狀況至為重視，認為中國在 1991 年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與 1996 年台海危機美國派遣航空母艦至台海獲得教訓，其軍力（尤其是海軍）的發展已經不可同日而語（Cole, 2008; Cole 2009; Kaplan, 2009, 45-58）。

雖然當前美國仍然是一個超級強權，中國的防衛與作戰能力仍無法與美國相抗衡，但中國軍力的崛起，並且透過在海上與美日等國船隻的對峙的方式展現其高度自信，已經讓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複雜化，也增加了介入東亞地區爭議的困難度。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就在美國空軍協會的一場演講之中說明，美國應對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工程和其對於干擾美國自由行動的能力感到關切，中國在網路、反衛星、防空、反艦、以及飛彈能力，都可能威脅美國在地區的軍力投射以及協助太平洋的盟友。¹ 中國顯然是看到美國受到國際環境限制，在許多國際議題上需要中國協助，而抓緊了這個崛起的「機遇期」。

2008 年的金融風暴重創美國經濟，也使許多國家受到嚴重影響。雖然中國本身也受到這波金融風暴的衝擊，但由於其相當強大

1. Speech by Robert Gates, 原文為 “In fact, when considering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rograms of countries like China, we should be concerned less with their potential ability to challenge the U.S. symmetrically—fighters to fighters or ship to ship—and more with their ability to disrupt our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narrow our strategic options. Their investments in cyber and anti-satellite warfare, anti-air and anti-ship weaponry, and ballistic missiles could threaten America’s primary way to project power and help allies in the Pacific—in particular our forward air bases and carrier strike groups. This would degrade the effectiveness of short-range fighters and put more of a premium on being able to strike from over the horizon—whatever form that capability might tak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9)。

的政治控制能力，不但能使金融風暴的衝擊降低，甚至在 2009 年 4 月於倫敦舉行的 G-20 高峰會中，一個整體經濟發展尚未完全飽和的中國，卻成為先進國家期待作為國際經濟發展的穩定力量。

在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09 年 11 月前往中國進行第一次訪問，便必須和中國討論經貿、能源安全、環境、反恐各議題上的合作，將中國定位為一個共同解決國際問題的伙伴，並且簽署一項極為詳盡的聯合聲明，作為兩國在這些雙邊或國際議題的合作範本，甚至在聯合聲明之中有關台灣的部份，應中國的要求放入「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文字。² 顯然美國已經無法像在冷戰結束之後不久時，可以充分發揮其對國際事務的主導，美中在 2009 年的共同聲明，是中國影響力崛起與美國面臨主導性霸權困境的很好寫照。

三、當前國際體系下影響力重整脈絡分析

中國崛起已經被認為是一個既存的事實，而且此一趨勢仍在發展之中，其軍事預算的增加與軍事現代化的努力都還在快速進行，經濟成長也尚未見消退，因此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也越來越高。在這種狀況之下，美國與中國就必須思考在各自尋求權力維護或擴大的情形下，如何共同面對這種變動的局面與本身角色的變化，尋求國際問題的共同解決，並試圖找尋平衡點，以避免雙方的權力的角逐演變成一個衝突的局面，影響到各自的重大利益。

國際體系理論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與國家的行為，與體系的不同與複雜程度、議題的型態、互動的架構、資源的分配與組織的程度有關（East et al., 1978: 143-60）。在此一邏輯思考中，

2. 該項聯合聲明全文刊登於美國白宮網站（The White House, 2009）。

在單一主導性霸權的國際體系之下，這個單極的主導性霸權是一個遊戲規則制定者，是體系秩序的維護者，是國際問題討論的議題設定者，無論該主導性霸權喜歡與否，這些都會被認為是其職責所在。

但是在這個體系之下，主導性霸權因為其無法取代的角色，而被要求面對體系需求而衍生的責任，解決國際問題。而當國際的問題越趨複雜，國際的糾紛與衝突增加，解決的困難度增加，都會影響該主導性霸權處理國際議題的能力，降低主導性霸權的影響力（East et al., 1978）。而若有像中國般的區域性強權之國力正上升中，而且具有強化其國力與影響國際事務的主觀意志與做法，甚至將以削弱美國的影響力作為拉抬其本身的影響力的策略，在合作與爭議的循環之中，不斷凸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重要角色，這將提高解決國際議題的複雜度與困難度，主導性霸權的角色與影響力也會受到衝擊。

本節將體系理論所思考的議題複雜度、國際衝突時對於具有實質影響力國的依賴、國際和平維繫的困難為主要分析重點，考量各種當前國際體系之下主要成員（如美國與中國）的互動，而不思考其他層次如個人決策風格、官僚政治或國際建制的議題，進行國際體系與國家兩個層次的聯結，探究在這種國際體系之下主導性霸權影響力升降之因果關係，並瞭解其影響力困境。以下為可供檢驗的分析：

（一）國際分工互賴加深造成國際議題更趨複雜：

現代經濟發展在日新月異的高科技帶領之下不斷創新，使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甚至許多對人們造成直接影響的事務，都已經沒有國界可言，不但大型的生產已經分散，甚至原本許

多屬於單一公司對於消費者的個人服務，都已經成為跨國分工的項目。如遠在美國的服務業電話聯繫中心是設在印度而非美國。這種經濟行為全球性細密分工的時代，就被描述為「地球是平的」（Friedman, 2007）。而這個發展，是在廿世紀末廿一世紀才出現的新局面，這種情況使得國際事務複雜化，再也無法以簡約的方式思考越來越複雜的國際議題。

以 2009 的金融危機來說，美國政府通過立法程序所成立的超大型房屋貸款機構 Freddy Mac 和 Fenny Mae 經營不善的結果，影響到其他跨國性大型金融機構，並且波及全球的金融秩序，連帶影響到大型的製造業的經營與國民就業的壓力。美國本身所受到的衝擊相當嚴重，除了多家跨國金融企業陷入困境甚至倒閉外，代表美國企業精神的汽車製造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失業率也到達前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新高。由於金融風暴的影響與衝擊是全球性的，因此有一些國家試圖以經濟民族主義為號召，以保護本國的利益。然而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是全球性的，而且國際經濟已經進入了細密的相互依賴，任何主要經濟體的過度自我保護，只會使得問題更加嚴重與難解，甚至越以片面的方式(unilateralism)的保護主義方式處理，就越難以達成解決問題的目標。因此，這個大問題的解決，就不是美國所能獨力完成的，而必須尋求跨國性的合作。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到找尋解決之道的過程之中，充分顯示了美國在這議題上難以主導的困境，不但要尋求歐洲國家共同參與解決的方案，還必須藉用與中國高層對話的機會，如美國務卿訪問中國、美國總統親自訪問中國、戰略經濟等管道，要求中國共同努力，避免危機進一步擴大，在此情形下，主導性霸權的影響力就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

除了金融危機的議題凸顯美國無力單獨主導之外，在當代還有

許多其他重大國際議題是美國所無法全然主導的，如環境保護、地球暖化危機、溫室氣體排放、能源安全等議題。民主黨被認為是美國較重視此這些議題的政黨，而 2008 年中美國還在總統大選進行的過程之中，民主黨人士就透露，將會在這些並非零合的議題上與中國進行合作，一方面可以讓議題獲得較好的解決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將中國納入國際的規範之中。這種處理的原則，一方面凸顯美國已經認知本身無法完全主導國際規範，另一方面也承認中國在這些議題上所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歐巴馬總統也在 2009 年 11 月中旬訪問中國，將上述各項議題作為對話的議題，並且首度將這些共同合作的詳盡意見放在聯合聲明之中，並以伙伴關係來定位美中關係，這是以往美中高層對話所未見的情況(The White House, 2009)。

(二) 解決國際衝突時對於具有實質影響力者的依賴：

在冷戰結束之前的兩極國際體系之下，因為兩強不願衝突升高至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影響本身的利益，因此當區域性的糾紛或衝突時，會對涉入糾紛或衝突的當事者進行某些約束，而形成一種平衡狀態。同時因為兩強在其集團內沒有其他的挑戰者，而可以在在其集團內部發揮高度影響力。這是為何國際政治學者普遍認為，兩極體系之下的國際關係是一種平衡且較容易維繫的體系。

但是當國際體系只有一個主導性霸權，因此當成員涉入糾紛或衝突中時，若有一個區域性強權可以作為替代性的支持者，地區性衝突的遊戲規則就變得複雜化，也使得衝突更難化解。主導性霸權既為唯一霸權，自然會被體系內的其他成員要求介入這些糾紛與爭議，因此就必須投入資源以解決問題，然而因為主導性霸權必須投入資源解決諸多國際問題，因此在衝突因複雜化而更難化解的情形

下，霸權介入解決的意願與能力都可能下降，其影響力自然也打折扣。尤其當體系內的地區性強權意圖以延長衝突來爭取其利益或影響力時，會對主導性霸權的影響力產生制約作用。之前所述蘇丹達佛地區的議題即為很好的例子，美國雖然被要求介入蘇丹，但對蘇丹並沒有著力點，而中國與蘇丹之原油與軍事關係而有很厚深關係，因此解決問題的方式就不是由美國主導，而需要中國的參與。

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美國除了必須面對中東地區的兩場戰爭之外，美國情報機構也發現，平壤政權可能已經擁有或即將擁有第一個核彈頭，這讓布希政府感到憂心忡忡，也因此開啟了六方會談。參與六方會談的國家中，對於北韓具有實質影響力的國家，也僅有中國一個，因此形式上解決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的機制是六個國家，但在實際的運作上，就僅有中國能在美國與北韓居間協調。而布希政府為了避免因為深陷中東地區兩場戰爭而國力分散時，還必須處理東亞地區的衝突引爆點，因此對北韓發展核武的議題就決定以外交方式解決，並特別任命國務院處理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Christopher Hill)擔任特使，其唯一的任務就是處理北韓議題。

雖然希爾在 2007 年達成了北韓自行摧毀寧邊核子反應爐的任務，但是在美國外交史上，一位助理國務卿的工作內容僅有一項議題是絕無僅有的現象。而美國為了處理北韓的核武化問題，認定中國是對於北韓有實質影響力的國家，因此努力尋求中國的合作，而且美國政府認定中國對於北韓摧毀寧邊反應爐有很大幫助(Hill, 2008)。這當然是美國自我承認無力單獨發揮對北韓的影響力，並且承認中國的影響力大於美國的影響力。而因為美國對北韓議題全然寄望中國發揮影響力，這讓美國在亞洲的最重要傳統盟邦——日本——感受到被忽略。在此情形之下，美中在國際議題影響力的升降

之對比看起來就相當明顯。

(三) 主導性霸權維持國際和平的困難：

在僅有一主導性霸權的國際體系之下，主導性霸權被期待負起國際和平維繫的責任，也可能招致不滿美國領導者的批評或攻擊。在 1990 年伊拉克的海珊 (Saddam Hussein) 攻擊科威特，老布希總統便領導多國聯軍將伊拉克佔領軍逐出科威特。然在 1998 年，美國於東非的兩個大使館遭到恐怖攻擊；在 2000 年，美國停在亞丁灣的柯爾號驅逐艦 (USS Cole) 也遭到恐怖攻擊。這兩次恐怖攻擊事件，也讓柯林頓政府決定向蘇丹與阿富汗境內的恐怖組織基地進行轟炸行動。³ 顯然美國利益受到直接攻擊是一個趨勢。在九一一事件爆發之後，小布希政府認定阿富汗為國際恐怖主義的包庇者，決定進軍阿富汗。而由於小布希政府也認定海珊政權對地區和平與美國利益的威脅，也緊接著對伊拉克用兵。除了直接影響美國的事件迫使美國進行軍事行動之外，其他國際性衝突和爭議也不斷發生，國際社會也期待美國的介入以維持國際和平。

以東亞地區而言，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之後，北韓的核武政策與飛彈試射，使得東北亞情勢顯得動盪不安，尤其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最重要盟友日本更需要美國的協助，以避免危機演成軍備競賽的局面。在台灣與中國之間，在 2002 年中因為中國的打壓與陳水扁總統「一邊一國」的回應，加上台灣的民主選舉循環，使得兩岸主權爭議不斷，也被普遍認為是一個衝突引爆點 (flashpoint)，而

3. 有關這些恐怖攻擊行動，美國聯邦調查局有相當多資訊，並曾向國會提出報告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01)；也有許多有關的媒體資訊，如 Zalman (2010)。

必須採行各種方式避免衝突升高。在東南亞地區，發生了緬甸軍政府屠殺僧侶的事件，迫使美國須要尋求介入的方式。在南亞地區，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核武與飛彈競爭顯得白熱化，成為軍備競賽的局面。此外，伊朗也積極發展核武與中長程飛彈，使得美國許多決策官員認為，伊朗對美國的挑戰比北韓更嚴重，而必須強化制裁的行動。另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爭議也沒有任何停止的跡象，尤其是巴勒斯坦缺少一個如阿拉法特 (Yassar Arafat) 般可以領導各派系的領袖，以巴之間的就缺乏任何和平協商的進程。而在非洲大陸，也有像辛巴威這種被認為是潰敗中的國家 (failing states) ，所造成的人道危機，當然也需要國際的協助與介入。而活躍於印度洋西岸的索馬利亞海盜，也影響海上航行的安全。這些地區性的衝突或爭議，美國都被要求介入解決。

此外，在武器科技不斷創新，武器來源取得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陷入衝突的國家擴大或延長衝突的能力也快速增加，所造成的傷害也會增加，也因此主導性強權被國際社會要求負起責任介入的呼聲也增強。然而因為國際體系不再像兩極體系般有集團內部的拘束力量，而使得爭議不易解決，主導性霸權所能發揮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在此情形下，主導性霸權在國際間的威信也隨著下降。

同時，若國際體系中有一崛起中強權，爭議當事國可能改而拉攏這一強權以強化本身的地位，而國際組織或國際社會也會對此強權要求負起更多的責任，也因此帶動其影響力上升。此外，美國本身卻受限於中東地區的場場戰爭，難有餘力處理其他國際糾紛，也必須尋求國際上的共同協助，包括聯合國或個別國家。而當美國環顧國際社會在找尋有能力或有著力點的國家時，中國就常被認為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無論這影響力是來自於中國與涉入爭議之國

家關係密切或因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的地位。而中國也成功運用其地位，一次又一次的被西方國家邀請協助國際爭議的處理，也藉此機會凸顯其大國的地位，因此中國除了派工兵進入蘇丹達佛地區外，也派遣艦隊進入印度洋，在朝鮮半導的核爭議之中也被美國認為對北韓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而當緬甸發生軍政府屠殺僧侶的事件發生時，中國也被美國要求對軍政府施壓。國際期待與美國本身能力受限的情形下，美國的影響力自是難以發揮；相對的，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卻扶搖直上。這種情況，讓美國的官員也深刻體會，中國與那些引發爭議的國家的密切關係而擁有國際影響力，這對美國形成嚴重挑戰（Campbell and O'Hanlon, 2006: 195-200）。

（四）主導性霸權與區域強權尋求平衡點：

在主導性霸權因為各種因素而導致影響力下滑，同時一區域強權因各種因素而致影響力上升，在此過程之中，雙方會為了本身利益而會有爭議發生。雖然雙方的基本出發點都在本國利益的維護或強化，但若爭議過大時亦將對本身的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部份重大議題的往返討論過程中，雙方也會尋求合作與平衡。對主導性霸權來說，這可以避免國際爭議難以解決，導致國力的耗損，也可以維繫其國際影響力不斷受到挑戰。而在重大議題上對與崛起中區域強權來說，也可以凸顯其國際事務重要角色的扮演，並且可以發揮對國際事務更多的影響力。

以北韓議題為例，美國原將北韓當作「流氓國家」（rogue state），美國對北韓的政策目標在於透過封鎖、圍堵與制裁的方式，以改變其行為模式或促使政權垮台。然而北韓的政策目標是在於提

升本身威脅他人與內在控制的能力，以維繫其政權於不墜。北韓對於美、日、南韓的威脅是軍事的，但是對於中國的潛在威脅則是北韓政權瓦解之後所可能帶來的災難，因此中國的政策目標則是尋求北韓政權的延續，甚至以北韓牽制美、日、南韓等國，因此持續提供北韓糧食與能源，甚至提供部份的武器技術。因此在六方會談的機制開始之後，此一機制就成為美國與中國之間尋求本身利益的場域，而各方為了本身的利益考量，最後是北韓寧邊反應爐被摧毀，美國將北韓自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剔除，並放棄對北韓的金融制裁，而中國則確立了其在朝鮮半島的重要地位，因而形成一個微妙的平衡。

以上的論述是由現實主義權力的概念出發，思考國際體系權力重分配的快速變動過程之中，主導性霸權與崛起中區域強權在國際議題上影響力的升降。這些討論都指向單一主導性霸權所可能面對的一些困境，雖然主導性霸權仍然維持強大的實質權力，包括軍事與經濟的能力，但其影響力並不一定與其權力相當；相對的，在這個國際體系之下有另一權力快速上升中的區域性強權，其影響力會因為體系內成員的尋求自我利益滿足或其他的情況，而使得此一崛起中的區域強權之影響力大過實際的權力。我們可以用這些論述更進一步驗證並理解目前國際政治上的現象，尤其是觀察與台灣息息相關的美中台關係，甚至以美國對台政策與台美關係作為一個可以深入解讀的議題。當然這些分析只是可以從現實主義所解析出來的一部份，而且只在理解影響力的升降，另外還有更多的規則可以被提出，用來解析目前的國際政治現象。

四、從軍售議題看美對台政策的微妙變化

中國對台政策雖然有領導風格的差異，但在整體上，中國對台政策目標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仍然強調「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而在統一大目標達成之前的階段性策略是強化對台的經貿吸引力，並且強化對台軍事的壓力。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中國政、經、軍崛起的態勢更加明顯，對台的操作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可以選擇。以政治方面為例，中國成功操作對台的統戰與分化，在經濟上對台吸納更強，在外交上有更多的實力對台進行打壓與封鎖，在軍事上則加深其部署。

相對的，對台灣的主要國際支持者美國來說，其選擇的工具卻受到了壓縮，美國再也無法依照其單獨意志，像在一九九六年中國對台文攻武嚇之際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海峽巡弋的做法，而必須要考慮到中國在軍上可能對美國形成的威脅。在美國蘭德公司2009年針對台海軍力平衡的報告之中，就說明了中國軍力崛起對美國協防台灣時所面對的戰略困境(strategic dilemma)(Shlapak et al., 2009: 139-40)。台灣一些研究軍事安全的學者也提醒，中國「解放軍在對台軍事行動上以防範第三勢力或外力介入是不爭事實」，這是台灣與美國所面對的一個新情況(楊念祖，2009：28-31)。

由於美國受到兩場久拖不決的戰爭的影響，再加上許多國際問題的羈絆，使得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在小布希總統於2001年上任之時，布希政府被譽為有史以來最支持台灣的政府，布希本人甚至公開在媒體訪談之中宣稱，要竭盡所能協助台灣防衛自己。但到布希總統卸任之前，美國政府資深官員對台多次公

開的批評，卻也被認為是歷來對台態度最嚴厲的，這幾年之間的變化幅度不可謂不大。

無可諱言，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最後的選舉操作，以及第二任期的中期之後的一些提高台灣認同與去中國化的做法，無論這些做法的目的為何，都引起布希政府的不快，這造成了布希政府在處理台灣議題時的一些嚴苛態度，如過境待遇、對台言論口徑等。扁政府的這些操作，使得在國際議題上感到日益困窘的美國政府，一方面必須擔心兩岸的緊張會不會迫使美國介入一場不願介入的戰爭，一方面也擔心是否能夠獲得中國在國際議題上即時且有效的協助。但顯然扁政府並非台美關係發生變化的唯一因素，因為馬英九政府上任之後，美台關係仍然受限，美國無論是布希政府末期或歐巴馬政府的實際做法與台灣的期待仍有落差，如軍售的延遲，以及 2009 年 11 月美中聯合聲明之中使用「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說法，都讓台灣強烈質疑美國對台政策是否產生重大變化。

事實的狀況是，在九一一發生後美國投入兩場戰爭，美國無論是官員或華府政策圈人士就不斷向台灣方面表明，美國力量已經分散薄弱 (spread thin)，不希望兩岸關係影響美國整體利益，也希望台灣能夠諒解美國的處境。在東亞事務之上，布希政府則將北韓議題作為一個可以對外宣稱外交勝利的指標，指定處理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全力處理北韓議題，也造成國務院決策體系處理台灣議題的位階相對降低。因此在布希總統的第二任後半，華府政策圈已有許多人士公開呼籲應該重新重視亞洲，尤其應該重視美國的傳統盟邦。這些人士包括曾任柯林頓政府副助理國防部長、新任歐巴馬政府的助理國務卿坎伯 (Campbell and O'Hanlan, 2006: 205-206)，甚至是布希總統第一任時的副國務卿阿米塔吉 (Richard

Armitage) 在卸任之後亦持相同的言論 (郭無患, 2007) 。

對台提供防衛性武器向來是美國支持台灣，協助台灣防衛安全的最具體指標。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就是依照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必要的防衛武器，並依照雷根總統對台六大保證，不與中方協商對台軍售事宜。布希總統於 2001 年通過對台三項軍售之後，先是台灣方面國內政黨競爭的因素，延宕了國防預算在立法院通過的時程。但當台灣在 2007 年終於通過預算之後，美方卻遲遲未將軍售通知書送交國會，一直延宕到 2008 年 10 月國會延會期最後一天，才將通知書送交國會，而通知書中所載武器項目，已經大幅縮水，台灣所追求的 F-16C/D 型戰機並不在內，台灣所要求的六套愛國者反飛彈系統只有四套，討論許久的潛艦並不在列，甚至台灣陸軍需求甚殷的黑鷹直升機也未在列。⁴ 而軍購的延宕與縮小規模的原因，在精研台海安全與台美軍事議題的專家眼中，是因為美國陷入了另一個越戰的泥沼，影響了美國政府對其他國際議題的關心。同時，許多國際議題的解決，中國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要角，也因此必須要思考中國的反應，也連帶使得美中關係越來越密切 (丁樹範, 2008 : 18-9) 。

F-16C/D 型戰機是台灣在 2006 年就向美方提出的軍購項目，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美國國防部其評估表達相當程度的信心，但是最終並沒有獲得白宮的首肯。但在 2007 年與 2008 年間，台灣仍然透過各種管道不斷向美方提出該項軍售需求。台灣方面也一度在雙方會談中詢問美方有關中國在軍售議題上中國的壓力，以及在 F-16 議題上有否特別之處，美方表示中國無論在任何軍售項目都對進行抗

4. 在白宮向國會送交通知書時曾有媒體報導，如曹郁芬(2008)。

議，而對於F-16的施壓力道更強於其他軍售項目。⁵顯然美方在F-16的議題上，已感受到中方異於平常的態度，而必須將中國態度放入考量之中（Wu, 2008: 5-8）。而國內也有軍方人員表示，美方曾在我方爭取軍購時向台灣的人員坦承：「有關美對台的軍售案，中國強烈反對的就是F-16C/D型戰機售台，並列為反對到底的指標個案」（沈明室，2008）。在2009年10月中國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訪問華府期間，中國私下向美反對、抗議軍售的做法更改為公開施壓，而使得台灣希望獲得的F-16戰機希望更加微小（林琮盛，2009）。在2009年11月中歐巴馬訪問北京時與胡錦濤舉行會談，美方向台灣進行簡報中也轉述，胡錦濤當面向歐巴馬表明反對出售高科技武器給台灣。⁶中國對於這個議題的做法，已經到了直接向美國總統表明的層次，而這正是歐巴馬政府在許多議題上都尋求中國合作的時候，而台灣要為此付出代價。

在2008年10月之前有關對台軍售的過程之中，華府一直有傳言美方將與中國協調軍售事宜，也有傳聞布希總統在參加北京奧運的儀式期間，將會事先知會中國領導人。而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令季亭（Timothy Keating）在華府傳統基金會指出，美方與中方曾針對軍售議題進行討論（Keating, 2008），然而此舉已與六大保證之內容有所扞格，⁷也與台灣關係法的內容有所差異。可以看得出來，在美國受到國際局勢拖累，美方對中方有所求之處甚多，因此美國在對台政策方面，才會有這些微妙的變化。這種新的情況已被部份美國政策分析家認為「目前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增加並且深入」，

5. 作者與美方官員於2008年6月10日午餐談話之中，美方作此表達。

6. 作者與美方官於於2009年11月23日會面時，美方作此表達。

7. 六大保證內容見錢復（2005：215）。

而且中國的影響力可能已經大到讓美國難以繼續維持其「平衡台海兩方」的政策，也因此認為有必要對此情勢進行更深入的討論（Sutter, 2009）。

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美國投入了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而這兩場戰爭耗費美國龐大軍力物力，並且遲遲無法獲得最後的解決，而在小布希連任的競選過程之中，美國對外戰爭就成為一個最重要的選舉議題。但到第二任開始之後，兩場戰爭的結束看起來仍然遙遙無期，布希總統的聲望持續探底，一直到2008年總統大選之前，甚至都讓其同黨的人士都開始與其劃清界限。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又必須面對其他麻煩的國際議題，當然也就不願意或沒有能力在台灣議題上與中國有所對抗，也讓中國對台灣的壓力更形增加，使得台灣無法即時全部獲得必須的防衛武器。這是在單極國際體系之下，主導性霸權必須負起國際責任時，又面臨另一個崛起中的地區強權的事實，所必須面對的捉襟見肘的困境。美國必須與這個崛起中的霸權尋求部份妥協，再也無法在所有的議題上自行其是。而台灣是一小國，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就面對這崛起中強權的更多直接壓力，而能夠獲得來自主導性霸權的支持也相形減少。

五、結論

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同時進行兩場戰爭，並且須要處理北韓、伊朗等多個重大的國際議題，使其在國際事務上受到諸多拘束。在同一期間，中國的整體國力不斷上升，雖然其軍事與經濟等整體國力仍然無法與美國相比，但因國際事務的分工互賴之加深與複雜化，中國與許多爭議當事國的密切關係而有實質影響力，導

致部份爭議當事國運用中國以平衡美國的影響力，加上美國介入維持國際和平的困難度增加，使得美國的影響力下降，中國的實際影響力卻不斷上升。而由於美國無論是在地區爭議或非傳統安全的跨國議題，甚至是在國際經濟議題之中，都還需要仰賴中國的協助，使得美國必須尋求在諸多議題中尋求和中國的一個平衡點，這些都導致中國在國際事務的重要性的提升，也凸顯了主導性霸權所面臨的困境。在這些趨勢之下，美國主導性霸權的地位維繫似乎已經發生困難，而這趨勢最終會走到什麼樣的平衡點，國際體系是否又逐漸重回類似兩極體系，確實值得觀察。

在冷戰年代，美國與台灣保持良好的盟友關係，而冷戰結束之後因為台灣民主化，而讓美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進入另一種形式的盟友關係。而中國對台灣的國際參與的封鎖或對台的軍事部署，向來是其外交與軍事政策的重要內容，這其中雖有國共內戰與冷戰遺留的陰影，但最主要的還是中國本身的對長期戰略發展的思考。因此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國際權力呈現快速變化對比的狀況下，我們也可以觀察到美國這個超級強權對台灣政策的變化與影響。雖然這些政策變化並非劇烈，但至少軍售的議題上已足以讓台灣這個夾於其中的小國感受深刻。

參考書目

- Allison, Graham T.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Campbell, Kurt M. and Michael E. O'Hanlon. 2006. *Hard Power: 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le, Bernard. 2008. "The Future of China's Military." Speech at Air Force Association, Maryland. in www.afa.org/events/conference/2008/scripts/Bernard_Cole.pdf.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 Cole, Bernard. 2009. "China's Military and Security Activities Abroad."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in www.uscc.gov/hearings/2009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9_03_04_wrts/09_03_04_cole_statement.pdf.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 East, Maurice A. et al. 1978.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Friedman, Thomas L. 2007. *The World is Flat: A Brei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icador.
-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01. "Testimony of J. T. Caruso, Acting Assistant Director, CounterTerrorism Division, FBI--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nd Terrorism,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in <http://www.fbi.gov/>

- congress/congress01/caruso121801.htm.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 Hill, Christopher. 2008. "Update on the Six-Party Talk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Statemen's Forum. in www.csis.org/media/csis/events/080701_chris_hill.pdf.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et al. 1985. 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aplan, Robert D. 2009. "China's Two-Oceans Strategy." 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 eds.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45-58.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 Keohane, Re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tephen D. 1983.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ating, Timothy J. 2008. "A Combatant Commander's Perspective on the Asia-Pacific." Heritage Foundation event, 16 July 2008. in www.heritage.org/press/events/ev071608b.cfm.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 Morgenthau, Hans J and Kenneth W. Thompson.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ei, Minxin.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ham, J. Peter. 2006. "China's Africa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28: 239-253.

Pham, J. Peter. 2008. "Strategic Interest-Kartoum's Partners in Beijing." in *World Defense Review* 31 January 2008. in <http://worlddefensereview.com/pham013108.shtml>.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Rothstein, Robert L. 1991.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Shambaugh, David. 2005.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irk, Susan L.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lapak, David A. et al. 2009. "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s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Dispute." RAND Corpo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in 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9/RAND_MG888.pdf.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Sorman, Guy. 2008. *The Empire of Lies, The Turth About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ha Puri. tran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Sutter, Robert G. 2005.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h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Sutter, Robert. 2009. "China's Power and the Fading U.S. Goal of 'Bala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Asia Policy* 8: 3-9.
- Terrill, Ross. 2003.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The White House. 2009.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in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us-china-joint-statement>.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9. "Speech at Air Force Association Convention. " in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379>.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 Vasquez, John A. 1983.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 Wu, Jaushieh. 2008. "Arms Sales and the Future of U.S.-Taiwan-China Relations." *China Brief* 8, 22: 5-8.
- Zalman, Amy. 2010. "Al Qaeda - Profile of Al Qaeda." in <http://terrorism.about.com/od/groupsleader1/p/AlQaeda.htm>. Latest update 29 March 2010.
- 丁樹範。2008。〈美國公布軍售案的觀察〉。《戰略安全研析》42：18-9。
- 沈明室。2008。〈美國對台軍售波折的意涵〉。《戰略安全研析》42：14。
- 林琮盛。2009。〈徐才厚：對台軍售，中美重要障礙〉。《聯合報》2009/10/29：A14。

張宗智等。2009。〈美艦南海偵察爆衝途，中美互控違法〉。《聯合報》2009/3/11：AA1。

曹郁芬。2008。〈總金額 64 億美元，美對台軍售八項變四項半〉。《自由時報電子報》。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oct/5/today-fo3.htm。2008/10/5。

陳世昌。2008。〈兩中型航母 中共明年興建〉。《聯合報》2008/12/31：A17。

郭無患。2007。〈前副卿阿米塔吉批評布希聽任中國增強影響力〉。《法新社》2007/9/3。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903/19/jthp.html。2010/3/29。

楊念祖。2009。〈中共海軍突穿第二島鏈爭議的剖析〉。《戰略安全研析》52：28-31。

鄭寺音。2009。〈美中八年來最嚴重爭端〉。《自由時報》2009/3/11。

鄭曉蘭等。2009。〈中國外洋型擴軍美日警戒〉。《自由時報》2009/5/6。

錢復。2005。《錢復回憶錄》。台北：天下遠見。

Dilemma of the Dominant Power Changing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after September 11

Jaushieh Joseph Wu *

The world has come to face an entirely new situation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world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 no longer so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became the only superpower which, with the help and support of its key allies, sets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nd formulates international rules of the game on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affairs. But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only superpower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has carried a much heavier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U.S. dominance came to a subtle change after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 The U.S. threw itself into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and the ongoing wars cost dearly. In additio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to cope with the danger of nuclearizing North Korea and Iran,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of humanitarian disaster in the Sudan's Darfur region, and meet the challenge of

*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ising socialism and anti-American sentiment in its own backyard.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power, in economic, military or political terms, has been increasing substantially. Even though China cannot equate itself with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of the U.S. and replace the role played by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ts influence can no longer be overlooked i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resolve difficult issues.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ic change and the change of state behavior as well as power and influence provide an ample opportunity for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test the international theorie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and realism, it explores the factor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 with U.S. arms sale to Taiwan as an exampl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September 11, dominant power, rise of China, regional power, international system, Realism, power, influence, Sino-US relations, Taiwan-US relations